城与年

谨以此书纪念

鲁迅先生、作者费定暨

译者曹靖华先生

俄普及本序

〔苏联〕科列斯尼科娃

《城与年》,“在这些异乎寻常的、惊心动魄的年月里,我们还没来得及从这一小时里醒悟过来,另一小时又把我们撞倒了。”费定在这部作品里描绘了战争与革命的年代。

这个线球,在读者面前疯狂地旋转着展开来。第一章是“小说收场的一年”。这一章写作品主人公之一——安德烈之死。这之后,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九一九年来到彼得堡的活着的安德烈。接着是一连串读者弄不清的事件。安德烈带着一封读者不知情的信,到了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家里。一个神秘的施泰因的出现,不仅使安德烈惊恐万分,而且使读者也不寒而栗。后来安德烈在十字街头碰到一个奇怪的女人,这女人竟是他的妻子。

作者一跳就跳到一九一四年,从彼得堡跳到埃朗根,从俄罗斯跳到德意志,这么一来,完全把读者带入迷魂阵中。

在那里又是头两章里的那些人物。就是第一章里枪杀自己挚友安德烈的那个库尔特。施泰因就是冯·舍瑙中尉。取丽塔地位而代之的是安德烈的第一个情人玛丽小姐。

总之,一九一四年是这部小说的开端。如果从这里开始读,一切事件就依次展开了。

富饶的、一模一样划成小方块的整个德意志,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里,“生活——这就是不要破坏和谐”的德意志啊。

在这里,人们每天都定时到罗泽瑙去纳凉。

男人们都把西服上衣一脱,把帽子系到背心钮扣上,拿着伞就走了。

他们刚迈出第一步,就脱掉西服上衣,把帽子系到钮扣上,

于是一切都在和谐所容许的节奏和韵律里行进了。

男人们是这样。

他们背后顺从地跟着妻子、女儿、岳母。都身穿白上衣，带着手提包和伞。

他们前边是儿子们：不戴帽子，穿着“罗伯斯庇尔”式衬衫，下摆束在短裤里。

战争的粗暴声音，闯入了德国市民恬淡宁静的生活：

“拿去，拿去，拿——去——吧！”

“号外！……”

“号……”

“……外！……”

“看吧，看吧！”

“哎——呀！……”

“我说过，我说过嘛！……”

“您看过了吗？”

“您呢？”

“您呢？”

战争把太平生活搅乱了。战争把两个朋友——俄国人安德烈和德国人库尔特——变成了敌人。库尔特把安德烈看成“祖国”的敌人，同他绝交了。

战争一步步吞没了德国的和谐与幸福。

作者集中全部注意力，描写了战争的后方。他憎恶战争。“战争是绞肉机。”脚一登上开往前线的列车的那些士兵，在他看来都是上断头台的人。

作者在这战争的恐怖里，用卓越的艺术巨匠的手笔，描写地主贵族德国的智慧如何黯然失色了。

把那些反战的士兵，都囚到一座寂无声息、死气沉沉的城堡里。有一天，从城堡里传来一声绝望的吼叫，从铁窗里伸出一双手，“在空中，在阳光下乱抓，忽而藏到铁窗里，忽而又伸到窗外来”，这印象在

读者记忆里是永远磨灭不了的。

表面上德国仍保持着自己过去的面貌。处处表现出模范的秩序。政府用尽一切方法使自己的国民在爱国主义的狂热里窒息。“供给消费者的全部产品，从药房的泻药到鞍掌铺的马套，都完全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外衣了。”可是在这些秩序后边，隐藏着日益激昂的反战情绪。

柏林放着活动西洋镜，“投十枚芬尼，你将目睹战争，”对于真正看见过战争的人，引起了强烈的反感。

通往充斥着断肢残体的医院小路上，竖着牌子，上边写道：

只准自行车通行。
只准行人通行。
只准骑乘通行。

可是不准一个人到那里去，因为不能让“和平”的德国人看到真正的战争。

可是在音乐会上表演“最新改良整形术”，表演“膝以上截肢，骑自行车上下楼梯”，“截去手腕的残肢表演打字”，“肘以下截肢的残肢使用铲、斧、耙、锤、刨及锯”。

德国真是发明创新的能手啊！千千万万的工厂主，在战争中都发财了。可是被毒气侵害了眼睛的士兵们都醒悟了，饱经忧患的妇女不再忍受了，革命在德国爆发了，疯狂的群众把城堡捣毁了。

作者强有力地表现了战争的可怕，但是不曾把革命的全部力量显示出来。革命似乎轻轻地滑过去，退居到无关紧要的地位。作者仿佛有意从一个小城的窗口来表现革命。德国十一月九日的事变，表现在比绍夫斯堡，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安德烈回国时，却遁入辽远的像塞米多尔那样的城市里。当安德烈来到大城市，他首先看到的是饥荒与破坏。

安德烈来到莫斯科，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画面。

人们像一群可怜的幼蜂，拥在篝火周围；一个半裸的女人，吊着两只空布袋似的乳房，在捉破衣服上的虱子；产妇在小土屋里大声喊叫，害伤寒病的人在三轮车下说胡话。

“跨过灌了石灰的尸坑，越过水陆两宜的蔓草似的断体残肢，透过哭泣、叹息和呻吟，沿着散布死亡的大地——这是通向生的道路。”

革命后的莫斯科，这是“在教堂的穹隆下，慢慢消失的驼背的身影；污水和垃圾堆上的癞皮狗；路上的死马；从人跟前，从废墟前，跨过兽尸和碎石堆，大声叫骂着赶着马车的马车夫……而这一切之上，是遮天蔽日、对即将灭亡的莫斯科发出哀鸣的密云似的乌鸦，莫斯科却蜷曲在土岗上，发出最后的喘息”。

作者的这段描写，充满着可怕的绝望。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战争的缺陷，这是他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用贫困与饥荒的琐碎细节，掩盖了革命，表露出同路人作家的目光短浅、不理解阶级斗争的深刻意义与革命的伟大。

破坏，死亡，埋葬——这是作者心爱的题材。安德烈到司令部领取委任状，在那里首先遇到的是一口棺材。随即那位大学教授就死了，接着就是出殡和墓地的描写。对人生非常乐观的列片丁，竟被残暴的匪徒绞死了。安德烈自己也死在朋友库尔特手里了。而安德烈给玛丽写的信有给死人写信的味道。

无怪乎对于死的感觉，是安德烈体验到的最好感觉。

> 每一秒钟都在死人，每一处凹地都是死人，每一个坑里都是死人，每一根柱子上都是死人，拐角处是死人，直路上也是死人！

对于死于破坏的敏感，费定在这部作品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战争的可怕，而革命在这里却显得非常暗淡。

费定对革命的感受，是害怕血弄污自己的手的知识分子的感受。他承认这血，崇拜它，但却害怕它。代表知识分子阶层对革命关系的典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安德烈，成为本书的主要人物，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对自己说：“我一生都尽力要站到圈子里。你明白吗？我想叫世界上一切事都围绕着我发生。可永远总是把我冲开，把我冲到一边去。”

所以把他冲到一边去，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过于集中到个人身上了。安德烈的全部生活，就是在追求个人的幸福。战争、革命，这一切都从旁溜走了。参加剿匪，也只是忘却自我、避免思考的

一种手段而已。

禁锢在个人狭小的圈子里，他把自己葬送了。

用不着慌张。也没有忙着要去的地方。都过去了——那些年月都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也不需要了；那些人永远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永远也不会了。往哪里去不都是一样吗？从哪里来不也是一样吗？你又能去得了什么地方呢？

安德烈是不会斗争的。他不能理解革命，因为这对于他依然还是那种战争，而他是憎恶战争的。他不会主动，他是被动的，甚至在恋爱上都不是他主动的：是玛丽先到他跟前去的，是丽塔先引诱他的。

这种消极被动，只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追求人生的意义——是安德烈走到死路上的原因。作者在作品的末尾承认道："啊，如果他身上沾过一滴血，如果他践踏过一朵花，那我们对他的怜悯也许会扩大为爱，也许我们就不会让他这样痛苦、这样卑微地死去！"作者这样对待主人公的态度，似乎是想把自己与安德烈区分开来。尽管有区别，但对于革命的理解，作者与安德烈是有共通之处的。安德烈成了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并不是偶然的。在这部作品里，革命居于次要的地位，也不是偶然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理解，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而且这一主题贯穿了费定已往的全部创作，这些也都不是偶然的。

安德烈是这部作品中写得最透彻的人物，他是知识分子最鲜明的代表，但如果他死得过早、死得不自然，这部作品中的其他知识分子，不过都是些活尸罢了。

"现在咱们都成鬼肚子里的粥了。胃液在消化咱们，过后咱们就顺着肠子蠕动，顺着十二指肠、小肠、大肠、直肠蠕动。咱们就是这玩艺儿啊。"谢波夫老头这样分析知识分子。

这部作品里的知识分子，都像"刨过的木板"，都一模一样。

库尔特是与众不同的。他也是知识分子，但是处在另一种情况下的知识分子。冯·舍瑙用最残酷的手段剥削过他。如果战争与革命期间，在安德烈生活中最大的是"爱"，那么在库尔特就是"恨"。这使他们两人截然不同了。这些年把往日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变成了

革命家，而从前走在库尔特前边的安德烈却叛卖了革命。

可是作者笔下的库尔特，也不曾摆脱知识分子习性。库尔特的友谊，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共产主义在库尔特的概念里，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杀害安德烈的举动，太像恐怖行动了。共产主义者对于背叛革命的安德烈，有别的办法。

作者似乎有意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典型代表玛丽，当做一位女革命者。她首先冲入城堡，往自己的家门上挂起比绍夫斯堡士兵代表临时苏维埃的牌子，在进入市政厅的通行证上盖着自己的私章。但如果对玛丽仔细观察，那她的革命性是带着一种冒险意味的。玛丽不过是一个要如何便如何的任性、狂妄的姑娘罢了。

她小时候登上三尼峰，把旁边人的魂都吓掉了；她去找石侯爵夫人，陷到地窖里。她在寄宿学校里跟冯·舍瑙中尉私奔了。最后，为了到俄国找安德烈，竟然随便嫁给一个俄国士兵，而在彼得堡一见安德烈身边的丽塔，就突然消失了，她的消失像她出现一样突然。

在这部作品中占特殊地位的是冯·舍瑙中尉的顽固的反革命性。他肩负着自己古老贵族门阀的重压。甚至连他与玛丽恋爱，也是为了传宗接代。“我考虑到自己的宗族，考虑到宗族与我自己的命运，同玛丽结婚，对我就成了必须的了。”他感到过去的重担压着他。“像我这样的人，我的祖父、远祖，历史早把一切都替我们决定好了。”他中了妄自尊大的邪魔。他收买了库尔特的画，他希望库尔特一旦成名之后，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画家的庇护者。他热中权势，想做领袖。他是“比绍夫斯堡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最感到优越的地方，就是穿那身笔挺的制服。这个典型的德国军官，这个在马路上遇到不会敬礼的士兵，当场训斥的德国军官，他与千千万万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从后脑窝到右耳上，有一道亮光光的粉红色伤疤。

在这部作品里，与所有的人都合不来的这位军官，通过玛丽与他们联系起来。玛丽是他进入这部作品的一道桥梁。轻佻、狂妄的玛丽，爱上了这位专横的侯爵军官。可是当她一遇见安德烈，就把那个军官当做外人了。

侯爵军官的孤独，有一种被命运注定的东西。应当替他传宗接代的玛丽，也离开了他，冯·舍瑙只剩下一个冠冕堂皇的爵位了。

作者对这位老贵族的后裔很感兴趣。他施展自己的才华，着力刻画这位贵族内心的愚钝和卑微。作者对冯·舍瑙的审判，是对即将灭亡的封建主义的审判，是对打着帝国主义旗号的穷兵黩武之辈控制的德国的审判。

但是作者成功地描绘了妄自尊大的邪恶的侯爵，却没有用同样的表现力与说服力刻画真正的革命者。

费定笔下革命家的典型是失败的，像他不善于描写真正的革命一样，他不曾刻画出活生生的真正的革命家。这些革命家在他笔下，也都退居无关紧要的地位了。他们都成了次要人物，在一两章里出现一下就消失了。

作品中唯一的一个工人就是迈尔工长，他在反战示威游行时，坚守自己的岗位，因此得到厂方的嘉奖。诚然，几年后，他因反战而被捕了，但读者并不知道他的转变。

塞米多尔的革命者，诸如戈洛索夫、波基森等，都描写得苍白无力。对安德烈满口讲革命天职的军代表，也是粗线条的公式化人物。

费定很少写无产阶级，但是他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把革命局限在爱国主义狂热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作者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合唱之友社社员、理发匠保罗·亨宁。他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大谈革命的意义及社会主义的伟大，但同时又代表理发业公会及合唱之友社，对萨克森王致欢迎词，过后，他怀着狂喜的神情，对朋友们述说国王如何同他握手，如何称赞他的嗓子。

保罗·亨宁就是惯于在左的言辞下做恭顺奴才以及在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的社会民主党的化身。

在这部作品里，农民所占的地位也很小。书中的一群农民也都是没有个性的。不过，他们之中也有一个有声有色的人物，那就是列片丁。虽然他的双腿被锯掉，成了可怕的残废，但他依然怀着乐观精神。他甚至在自己极悲惨的境遇中，找到积极的东西。“可是我种菜顶用着呢。活重着呢，女人还顶不了。可对我算得了什么？我的手可以入地半尺深，而且我连腰也不用弯。好极了！”

这是一个积极的、有作为、值得同情的人物。可他完全是孤独的，列片丁周围的环境，跟普通农村一样，作者并没有把它写出来。

费定是一位都市诗人。他不了解农村，他怀着昂奋的心情写都市的一切声响，写耸入云霄的大厦，写汽车的笛声。

费定是一位文字巨匠。他长久地、审慎地、顽强地在文字上下工夫。他塑造的形象，读者不仅能看见，而且能听见。

彼得堡嗖嗖地剥落着铁屑，铁屑在屋顶上击得乱响，沙沙地落到石铺的街道上。

湿溜溜的石板路上响起嗒嗒的进军似的，热情洋溢的响亮的碎步声。

一辆辆自行车，轮带贴着干干净净的白色马路，沙沙响着向左右驶去。

作者不但善于绘声，而且善于绘形：

一个老头走过去，他的上身向前倾，两脚落到身后半步远。他的脚用湿透的厚厚的破布裹着。他留在人行道上的脚印，就像湿拖帚留下的痕迹。

城市的音律都表现在运动中。

在格尔库列斯广场，在喷泉对面，有一道年久残破和用薄刃厚背刀挖了些洞的沉重的门。

她进门后，登上楼梯——六十七级阶梯，如果隔一级一步，那就是三十四步。如果你来得准时——按市政厅的钟，晚上八点，——第四层上的楼梯门就开着。进门后，经过穿堂，一直朝前走就到了。

大都市的匆忙、急迫，反映在这部作品的整个结构里。这种匆忙与急迫，也正说明了若干事件的混乱与堆积。小说从收场开始，也是加强行动速度的一种手法。

作者很少人物性格的描写，我们在行动中认识了这些人物，我们不知道他们眼睛的颜色，但我们看见他们，在遇到他们时就认出他们来。

作者最喜爱的手法是对比。整洁明亮的德国与混乱破烂的俄国对比。吉祥如意的后方与战争恐怖对比。革命力量与饥荒的惨景对

比。

作者常常爱用重复的手法，像酬唱似的，在整个作品里，多次重复："嘿！萨克森的女人真漂亮！"同丽塔离别，完全同样的话，就重复了两遍。"人要想在都市里就像森林居民在森林里那样"，在两页中重复了三遍。

紧紧地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使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小说事件的展开，使他们不终卷不释手，这表现出作者艺术手法的卓越魅力。

这部作品虽然在思想上存在一些缺陷，但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拥有广大的读者。

我们非难作者不善于刻画革命，没有看到真正的革命者，但我们应当承认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德国伪善的描写，对于利用人民的爱国热诚投机的德国军国主义者嘴脸的刻画是辉煌的艺术成就。

作者不了解革命，不能像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作家那样把革命表现出来。他不能像他们那样表现革命，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艺术思想在革命前就形成了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一切都在前头，
而我们的前头一无所有。

狄更斯

至于饮酒，他喝的是水。

雨　果

小说收场的一年

演　讲

“亲爱的街坊邻居们，最善良的居民们，尊敬的公民们！我从窗口探出身来，把我考虑好的意图对大家讲一讲：亲爱的街坊邻居们，我很苦闷，尊敬的公民们，烦恼撕裂着我的心，我的心都干枯了，像烈日下马路边的柠檬皮一样卷起来了。

“尊敬的居民们！现在是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了，这不错。

“我面前有八十五扇窗户，除了楼顶上的两扇、地下室的一扇、战前油漆匠在墙上精巧地描的一扇，以及诸位能认出我的上半身的这一扇不计外，我面前共有八十五扇窗户。

“我本可以把每扇窗的情况都告诉你们，但我知道你们不会听的。因此，我请你们只注意下边那扇窗，就是晾着条纹布鸭绒褥子的那扇窗，每天早晨，两手通红的女主人总用步枪的探条拼命抽打褥子。还请你们看靠右边的那扇窗，就是从早到晚传出三弦琴声的那扇窗；再请你们看楼顶下边最高的那扇窗，就是留声机不停地放浪漫曲的那扇窗；最后，请你们看正对着我的那扇窗，也就是刚打过腻子的那扇窗，明天还要上油漆呢。

“尊敬的公民们！共和国究竟不是一个坏玩艺儿。在共和国里可以拍打鸭绒褥子，把它放在太阳地里吹吹风，不怕被人偷走，晚上只能用褥子套来铺床。在共和国里可以有鉴赏音乐的能力和学习三弦琴。显然，国家政体的形式，绝不会影响到唱片的质量。末了，共和国很轻易就懂得用油漆窗框来防风雨是顶好的。

“亲爱的街坊邻居们！咱们院子里的这八十五扇窗中，只有我这一扇窗没有点缀着一包包干酪和香肠，以及装着奶油和酸奶的小罐、小锅、牛奶罐、黄油罐，没有点缀着鲜绿的葱和大红的萝卜，这

值不值得一提呢。甚至连那个像通风口一样大的靠边的楼顶上的窗子，跟我这布满蛛网，神圣不可侵犯地保留着我那可敬的女房东的猫马特罗斯的不大客气的猫爪印的空窗台，比较起来，也都讲究得多了。

“现在是白夜，白天流了一天汗的夏季，在咱们的天井里休息了。八十五扇窗都大开着。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你——放唱片的先生，也对晾鸭绒褥子的邻居，对有小锅、黄油罐、罐子和萝卜的人——对所有探出头听我有力的声音的人，我对你们讲几句话。

“唔，你们别害怕：我的话不会扯得太长。我想对你们提一个问题，总共提一个问题就完了。

“最善良的居民们，尊敬的公民们！现在是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了，这不错。这不错，因为咱们吃奶油和酸奶，学三弦琴，晾鸭绒褥子。这不错，因为上边所举的那些营生，虽然缺少革命的气味，可是共和国并不反对。尊敬的公民们，你们觉得对不……”

讲到这里，突然传来一声震撼着这片毗连的石头房子的尖叫：

“安德烈！”

一个穿着敞怀衬衣的人，停止了演讲，向传来喊声的地方望了一眼。后来，他突然向房间深处退了一步，又跑到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用迟钝的声音问：

“几号房间？”

“咱们到街上见吧！”一个声音落到天井里。

安德烈依旧敞着怀、蓬着头，从屋里跑出去。

女房东随后锁上门，向天井里望了一眼，向八十五扇窗瞟了一下，用颤抖的嘴唇嘟哝说：

“我早就想着他发疯了！啊，太可怕了！”

书　信

我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而且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最怕你一认出我的笔迹，就会把信撕掉。

安得列疯了，在室内隔窗对着人民说



也许不是这样。我最怕给死人写信。最怕你死了。我不说你已经死了，我给你写信。

玛丽，我的小宝贝儿，有一件事我明白了。从前有好多事，我觉得都是明白的，你记得吗？现在有一件事：我要同你并排坐在一起，把一切都说一说。不知怎的，不能把一切都一一想起来。有一件事是明白的，就是如果你听我说，那么一切我都会谅解，你也不至于像两年前一样大喊大叫。那时你吵得多厉害啊，玛丽……

我有点闹糊涂了。

别忙，我在房间里走一走，想想怎样更简单明了地把最要紧的说出来，玛丽……

是的。我觉得，如果我说出来，你一定会明白我的……或者，不，开始说这个吧。

整个混乱（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也许会找到力量来好好写一封信），整个混乱都是由于我决定……玛丽，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要去找你。我决定了。我不能再这样了。反正一个样。我要把两耳塞起来跑掉。让他们去嚎哭，去死吧！我应当去找你。

库尔特是个真正的人。今天真是出其不意，我在彼得堡碰见他了。他负责把我弄走，就是说帮我的忙。他听出我的口音，虽然当时情况很特别。总之，我的情况很糟。库尔特马上就说我应当换换空气。当然，我一个字也没有提及说我想见你。关于换空气的问题，我同意了。玛丽，当人家提到气候、提到神经，我有点好笑。虽然我非常疲倦。可是库尔特却毫不知倦。

事情是……

我把开头又读了一遍。这就是我的故事。我想起有一年冬天，我碰见一只狗，那狗用前爪在锁着的门上乱抓。狗的主人是睡觉了呢，也许是不愿开门：当时风雪飞扬。我走到门跟前，看见被踩的雪地上，有狗爪的红血印。狗在抓门，血把爪子都染红了。

它不会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是无用的了。